

鄭振鐸和泰戈尔文学

——在文学研究会結成前后時期的文学意識之一面——

芦田 肇

鄭振鐸（1898—1958）是文学研究会的發起人之一，可以說，他也和茅盾並肩，對於形成該会整体性的文学傾向与實質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学研究会未成立之前，「五四」運動剛結束的時候，就在北京，1919年11月，鄭振鐸与耿济之、瞿世英、許地山、瞿秋白等人創辦了《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雜誌被禁止出版后，1920年8月，他們又出版了《人道》月刊。在《人道》第一号上登載了印度文学家泰戈尔（Tagore. R）的詩歌《偈檀伽利》（Gitanjali）。這就是由鄭振鐸翻譯的。但《人道》只出版了創刊号，其后不久，即從同年11月起就以鄭振鐸為中心的結成文学研究会的籌備醞釀起來了。

鄭振鐸竭盡全力結成該会，這可以說，也是他的「文学覺悟」的一種反映。換言之，對鄭振鐸來說，這樣的「文学覺悟」的結果就是要結成文学研究会。

那麼，成為鄭振鐸的「文学覺悟」的契機究竟是什麼？

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從接收外国文学的方面来看，鄭振鐸在《小說月報》或其他文学刊物上，除了關於俄国文学的評論、翻譯之外，陸續地登載了大量的泰戈尔的詩歌翻譯及其關於泰戈尔之文学藝術認識的一些評論。而且《小說月報》的兩本「太戈爾号」是由鄭振鐸担任該雜誌的主編的時候發行的。這一系列事實說明他自己始終如一地对泰戈尔文学抱有強烈的好感，傾倒于泰戈尔文学。這方面来看引人注目的是，在即將結成文学研究会的時期，《人道》上由他翻譯了泰戈尔的《偈檀伽利》。這不但是鄭振鐸對泰戈尔文学有興趣的最初表現，而且《人道》這個時期對鄭振鐸來說也是思想上、文学上的一个轉變期的表現。

在敝論里，為了要理解鄭振鐸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前后時期的文学觀的實體和位置，剖析他那時期獲得「文学覺悟」之原委，并析出成為他的「文学覺悟」底主要契機的泰戈尔文学之接收以及他在文学研究会結成前后時期的文学意識之一面。